

哲里木盟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哲里木盟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回忆在科左中旗的战斗生活	李永春(4)
凤凰山事件	张汉民(13)
回忆在科尔沁的一段战斗经历	曹徽凡(22)
收复通辽	宝音达来(29)
哈拉乌苏庙南沙坨追歼战	宝音达来(32)
解放吉尔嘎朗	特古斯(35)
回忆吉尔嘎朗战斗	昭那思吐(38)
卓哩克图亲王乌克善及其后裔	李景唐(42)
扎鲁特旗末代王爷勒旺端儒布	却吉僧格(56)
《北斗》周刊始末	苏星(1)
通辽市街巷路资料	王玉涛(59)
“黑塔”事件	武连科(73)
历史上的鄂尔土板	梁凤云(78)
通辽“八大家”	杨德田(85)
哲盟历史上的行商与蒙民自赴商埠	王维龙(100)
国民党占据开鲁期间成立的几个文化组织	刘建国(113)
回忆通辽地区的鼠疫防治工作	薛公维(116)
一九四七年通辽地区鼠疫的流行及防治	张尔捷(124)
忆五道井子鼠疫之害	臧世志(130)
哲里木盟蒙医史料	陈西日巴(133)
我在开鲁开设“杨氏医院”的经过	杨润田(141)

我的父亲乌庆霖·····	乌震航(145)
红军团长皮时和·····	韩玉臣(160)
忆斯钦朝克图同志·····	好特老(17)
苑荫芳自传·····	(165)
行医六十年·····	赵文全(175)
我的教育生涯·····	王家骥(193)
包善一其人·····	象山(200)
锡勒图库伦三大寺·····	齐克奇(216)
科尔沁医明经院——敖特奇庙·····	额日很巴图(238)
后记·····	(247)

《北斗》周刊始末

苏 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在开鲁县主办《北斗》周刊(油印),共出版13期,12月停刊。

《北斗》是文艺刊物,内容有小说、诗歌、杂文等,后期也有一些政治评论,主要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并批评一些反动言论。

在《北斗》出刊的同时,成立北斗艺文社。开始组成人员有我、方滦(原名高义,天津医学院离休干部)、张羽(原名崔锡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石庚(原名刘秉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主任)、刘沛(原名郭松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还有李栋原(鞋匠,喜爱文艺)、杨金音(在北京外贸学院工作)、郭梦蘋(养鸡的)。李、杨、郭进入开鲁县国民党县党部,便同北斗艺文社脱离关系。后来,赵文芳(曾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已逝世)、陆丰(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患病,现情况不明)相继从长春归来,加入北斗艺文社。他们带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一些进步书籍,对我们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是大学生。赵文芳被推选为北斗艺文社代表。

1945年9月,开鲁县成立国民党县党部。《北斗》第5期发表一篇姜轩春(原为中学教师)写的杂文,文中有“鱼

哉，鳖哉，诚不啻混元之子也”句，县党部宣传科长陈森就认为，说鱼鳖虾蟆一齐上市，是讽刺它们的，调查作者为谁。我于第6期写了《北斗启事》批评其特务行为，从此和县党部产生磨擦。

北斗艺文社的赵文芳、陆丰在开鲁中学兼课，讲授新民主主义，提倡用新文字，中学高中部学生经常在北斗艺文社聚会（后来石庚、刘沛等都到高中部上学）；《北斗》的政治性文章（包括评论国共会谈的文章）增多；帮助红军之友社（该社是由苏联红军中的三名中国人为主组成，后来八路军派来联络人员，在开鲁建立武装）印刷传单……。国民党甚为不满，散布“北斗艺文社是八路军大本营，高中是外围团体。”1956年，赵文芳来北京告诉我，当时国民党县党部的刘树柏曾在一个教室里持枪问他：“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其实，北斗艺文社同红军之友社并无组织联系。

当年11月，国民党县党部同张念祖的地方维持会合流，便对北斗艺文社采取强硬措施：一是提出检查文章（我们没有理）；二是由地方维持会出面收回《复旦时报》（油印），断绝经费、纸张来源。在此之前，《北斗》是靠帮助维持会编印小报（负责人是维持会派的）取得纸张、经费，小报收回，便无法出刊了，因而被迫停刊。

附：苏星同志给景富、高原同志的信。

景富
高原同志：

很高兴收到你们的信。很想回家乡去看看，事务缠身，

迄未如愿，只好俟诸来日了。不过，我们总会有机会晤面的。

《北斗》周刊作为历史，算不了什么，顶多在开鲁县团结青年选择进步道路（我自己当时也在选择）起过一点点作用。但此事熟悉内情的人不多，写出来，作为历史资料，也许还有点用处。

我的这个材料是根据记忆如实写下来的，其中涉及到一些人，只是就事论事，并不是作什么评价。

此材料我建议你们单独在县《文史资料》上发表。你们写这段历史也可以引用。当否请酌定。顺颂

夏祺

苏 星

1987、5、9

（苏星，《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全国政协委员）

责任编辑 冯庆和

回忆在科左中旗的战斗生活

李永春忆述 王明义整理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很多蒙古族进步青年汇集于当时的科尔沁左翼中旗所在地——巴彦塔拉，以寻求民族的解放。我和拉喜宁布也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份从家乡海力锦来到了巴彦塔拉，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们到巴彦塔拉后，就住在李青龙（胡和鲁）家，因为他的亲属前德门和我们是同学。当时有不少蒙古族进步青年都住在他家。李青龙在日伪时期曾担任过科左中旗公署总务科长，后来当过我方旗长，是一位开明的民族上层人士。我们在李青龙家住了二十多天后，一九四五年十月底，听说旗维持会直属武装巴彦塔拉独立中队（当时是比较进步的武装，后改编为内蒙古骑兵二师十一团）招兵，我和拉喜宁布就找到这个中队要求当兵。接待我们的是中队长王殿荣（蒙古名拉瓦，后曾任内蒙古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他仔细地询问了我们的出身后，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说：你们俩人都是念过书的，当兵扛枪打仗能吃得了苦吗？当时，我们虽然感到入这个中队当兵不那么称心，但觉得为了百姓过个太平日子，当兵打土匪，维持社会治安也是个好事，因此，就表示

了愿意当兵的决心。这样，王殿荣就把我们留下来了。当时，科左中旗形势很乱，各种势力互相争夺，而且土匪四起，使人民不得安宁。我当兵后不久，就与土匪打了一仗。有一天，王殿荣找我说：“协拉巴拉（我的蒙古名），这回我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到八路军那边去学习，回来后把一些道理给咱们讲讲”。我问都谁去，他说：“咱们中队就去你一个人”。这样，经李鸿范统一介绍到辽北行署，然后与八路军的同志一道到双辽县乡下参加反霸清算工作队。当时和我一起去的有孟再生、苏宁、刘金德等三人，他们是从民主青年同盟派去参加的。反霸清算工作队的任务是清算恶霸、日伪汉奸、惯匪，一般地主不清算。工作队下乡后，发动群众诉苦斗恶霸，这也自然使我想起了我家苦难的过去。我从小失去父母，家境贫寒，全靠我两个哥哥给地主帮青扛活，省吃俭用，把我养大的，并供我念私塾，直至在日伪师道学校毕业……。我第一次认识到共产党和穷人是一家，是替穷人说话办事的，因此，跟着干得非常起劲。

两个多月很快过去了。回队后，王殿荣对我说：“你都学习什么了，给咱们讲讲吧”。我说：“怎么讲，我这个当战士的能讲好吗？”他说：“那你当文书吧，我给你召集会，你就大胆讲”。于是我就在会上讲共产党怎么好，八路军怎么好，怎样斗恶霸斗汉奸，怎样替穷人办事等等。这个中队成份很复杂，差不多一半人都在日伪蒙古军队里当过兵，在唐山一带驻过防。我在会上讲共产党、八路军如何好时，就有人在会下讲怎么在唐山打的八路军。还有的说，别听他的，他算老几，把八路军吹神了。这样，双方经常辩论，有一次吃饭时，争论得很激烈，幸好没有动枪。

一九四六年二月份，东蒙军政干部学校在巴彥塔拉成立。招考学员时，我和拉喜宁布都报考了。不久公布名单，我们都被录取。这次共招收学员约一百五十人，预定学期三个月，三月一日正式开学。校长由乌力图兼任，副校长李鸿范、章泽。学生编大队，大队长叫庄子（以后曾任过十三团团长，因叛变被我方枪毙），我是小队长。在军校里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学习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的国内外形势及国共两党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政治主张。在学习中学员们争论很大，各持己见，互不服气。我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反对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章泽老师，他和藹可亲，平易近人，对我耐心地进行启发教育。还有李鸿范、色音巴雅尔等进步青年，对我的启发帮助也不小，至今记忆犹新。大约学习了二十多天后，梁一鸣、李鸿范、色音巴雅尔等同志都先后找我，对我说：我们要在巴彥塔拉搞反霸清算试点，叫你参加。为什么叫你参加呢？一来你学习积极，二来你在双辽县参加过反霸清算斗争。我感到这是组织上信任我，心里热乎乎的。这样，我就由军校出来参加了反霸清算工作队。和我一起参加工作队的有陈塔兴嘎老师和那顺、敖勒本勒（一九四六年已牺牲）等同志。

工作队在乌力图、梁一鸣、色音巴雅尔等同志领导下，在巴彥塔拉开展了反霸清算斗争。经过发动群众，调查摸底，我们把斗争重点首先集中在一个叫商达夫的奸商身上。这个商达夫从日伪时期起开油坊，与日伪警察勾结起来盘剥群众，借搞配给之机往油里掺米汤，引起了民愤。我们发动群众进行说理斗争，分了他的财产，并把他抓了起来。

一九四六年五月份，国民党占领郑家屯。五月下旬，盟政府转移到通辽，乌力图、梁一鸣等同志都去了。旗政府也由巴彦塔拉迁到了架玛吐。组织上把我留在巴彦塔拉任副区长。不久，组织上又增派了一个区干部叫特格喜，当时，巴彦塔拉区政府实际上只有我们两个人。那时，我才二十二岁，无人无枪无经验，而巴彦塔拉又处在与国民党斗争的前沿阵地，真不知工作从何处下手。在这期间，章泽、梁一鸣、色音巴雅尔同志都先后找过我，并派人给我送来一匹马、一支枪。有一天，梁一鸣、色音巴雅尔同志来了，和我谈了好半天。他们对我说：你要想在这里站住脚，活着出去，有两条千万要记住：第一条，解决依靠谁的问题，要靠苦大仇深的，赓青扛活的，斗恶霸最积极的；第二条，光有人不行，还得有枪杆子。你赶快把巴彦塔拉区内的枪收缴上来，谁斗恶霸地主最积极，就把枪交给谁。要做到这两条，首先你得给群众办好事，群众才拥护你。还有一条，盟政府、旗政府虽然撤走了，但是巴彦塔拉还驻着十一团呢，你要和他们搞好关系，依靠他们。那时，十一团政委叫耿青（后任国防科委六局局长，现已病故），团长叫那仁（后任呼盟军分区副司令员，现已离休）。按照章泽、梁一鸣、色音巴雅尔等同志的意见，我们在巴彦塔拉开展了反霸清算斗争。首先把斗争重点集中到二贝子身上。二贝子是达尔罕王爷的弟弟，蒙古名字叫色拉哈旺珠尔，因为排行老二，又是清朝时的贝子，因此，人们习惯地称他为“二贝子爷”。二贝子有个大女婿叫甘珠尔扎布，日伪时期任通辽地区第九军管区中将司令官，他的家也在巴彦塔拉。其次还清算了卓王的家，因为卓王当时在国民党占据的郑家屯挂起了科左中旗政府的

牌子，并准备接受科左中旗。我们按照在政治上斗垮，经济上分光的精神，发动群众斗争了二贝子，并把二贝子和甘珠尔扎布、卓王家的财产（有粮食、衣物、银元、牲畜等）都分给了贫苦农牧民，把一批马匹补充给十一团。这样，很快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各屯清算委员会相继成立，几个村屯联合起来开展反霸清算斗争。与此同时，我们着手收缴枪支，建立武装，先后收缴了各种枪支五十多支，光是在二贝子家就搜出崭新的日本马枪二十多支。在甘珠尔扎布家搜缴出一支连蓝漆都没掉的二号匣子，打起来和小机关枪一样。拿回来后，大家都说，这枪给区长。于是，我把这匣子一直带在身边。武器有了，我们正式建立了巴彦塔拉区政府直属武装工作队。成员有四十多人，队员大部分是在反霸清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这时，巴彦塔拉区干部已有四人，我是区长，特格希是区政府干部，特木尔是武工队长，海龙是武工队文化教员。

区武工队建立后，为我们顺利开展工作提供了保证。一九四六年八月份，我们巴彦塔拉武工队改编为科左中旗旗大队第四中队，色音巴雅尔（当时任旗大队大队长）同志宣布我为中队长，特木尔为指导员。我们这支队伍从一九四六年五、六月成立到一九四六年九月一直战斗在与国民党斗争的前沿阵地。在这期间，国民党的小股骑兵骚扰我们好几次，与他们发生过多起战斗。我们还积极支援前线，为过路的我军部队提供粮食、给养，看护伤员，整天忙个不停。我们中队虽然处在第一线，倒也没有出现大的损失。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大约是一九四六年八月份，有一天群众来报告，说有三个形迹可疑的人。我们

就派人把他们抓来了。他们都是老百姓装扮，开始审问时什么也不说。后来，我们发现他们时而往衣领上邪视，而且发现他们的衣服领子都缝着。撕开后，从里而搜出了国民党谍报人员的身份证。三人中两个是国民党少尉，一个是中尉。我和特木尔同志商定，派特格希同志带几个队员把他们押送到旗政府架玛吐去。押送途中，几个特务以为是把他们带出去枪毙，我们押送的队员也没有把他们三人连着捆。路过一片高粱地时，这三个特务趁天黑，分头钻进高粱地逃跑，结果都被我们的战士打死了。

一九四六年九月，国民党向巴彦塔拉地区进犯，敌众我寡。十一团把消息告诉我们，并通知我们尽快撤退。于是，我带领四中队的全体同志，共四十多人，沿西线（大郑线）撤退。不久，到了庄头区。区长叫那德那扎布，还有个旗里干部叫白济民也在那儿。他俩都是我们巴彦塔拉军校的同学。在庄头区住了几天，我们几个人一商量，决定到架玛吐去找旗大队长色音巴雅尔同志。

九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开始向架玛吐进发。走了整整一天，到架玛吐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我把中队部设在镇内的一个油坊院子里，把战士分散在油坊二百米左右的一个原日伪警察署大院的周围。这个大院，四周是高墙，还有炮台，是镇内的制高点。院内还关押着一批旗内的恶霸、地主、日伪蒙汉奸，由旗大队十多个战士看守。当时在旗大队工作的有沙梯（后曾任内蒙古团委副书记）。我把队伍安顿好后，立即向沙梯同志询问了情况。他告诉我：最近在宝龙山、海力锦一带，有三、四百名反动地主武装，这里面还有十一团叛变的一部分，他们要去投降国民党。他们人数比较

多，武器也比较好，有机关枪、小炮，你们要当心。宝龙山、海力锦离架玛吐只有几十里路，而且他们都是骑兵，说到就到。沙梯同志这么一讲，使我提高了警惕。

我睡下时，已经是半夜了。也许是思想上有警觉，也许是离家乡近了，这一夜，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了，沿着镇内的土路，向高坨子走去。

九月草原的清晨，已略带凉意。我站在高坨子上向我的家乡海力锦凝望。我想起了在海力锦的童年生活，想起了早已去世的双亲……。突然，在我的前方尘土飞扬，黑乎乎的一片，象跑大荒似的涌来。我仔细一看，是敌骑兵包围上来了。我边往后退，边打枪报警。我回到油坊时，战士们都聚拢来了。天一亮，我们就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打到午后三、四点钟时分，敌人把旗政府大院打下来了。旗大队的十多名战士有的牺牲，有的受伤。敌人攻进旗政府大院后，把那些蒙汉奸、恶霸都放了出来。我们这个中队的四十多名战士一直在油坊大院子里和敌人战斗，敌人把旗政府大院攻占下来后，又集中兵力攻打油坊，居高临下，朝我们打枪，把油坊包围得严严实实。他们的好几次冲锋都被我们打退了。打到最激烈的时候，敌人往院子里扔手榴弹，我们往外扔。我的帽子也被打了好几个枪眼。

我们被敌人压在油坊里，外面的情况一点也看不清，我心里非常着急。急中生智，我把油坊临街的扎板卸下两块，想看看外面的动静。刚一伸头，我们中队有个叫根敦扎布的班长把我使劲一拽，使我摔了个大跟头。我火了，问：“你想干什么？”他说：“你不要命啦！你卸扎板的时候，敌人的枪口早就对着你啦，你一伸头，敌人肯定打枪”。我说：

“那也没办法，不看看外面的情况，咱们在这等死吗？”他说：“要么我先看”，他刚一伸头，只听“砰”的一声枪响，就把他打倒了。我急忙上前把他扶起来一看，子弹从他的胸部穿了出去，幸好没伤着内脏。我们急忙给他包扎了伤口。我默默地看着他，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多好的战士啊！

仗打到下午五、六点钟时分。我想，再这样打下去到晚上可就不好办了。我们几位一商量，决定突围。我们将突围的决定向战士们宣布后，他们也感到这是唯一的一条生路。在做了一些准备后，四十多个骑兵“呼啦”一下子冲了出去。敌人做梦也没想到我们敢这样做，有些惊惶失措，但又很快集结兵力。这样我们在马上打，敌人在后边追，很快就摆脱了敌人。在突围的过程中，我们有个叫韩德的战士牺牲了。有四名战士在队伍突围的时候大概没及时接到通知，还留在院子里打枪。后来见我们突围了，他们也往外冲。我们已经过了新开河了，他们没看见。两人在前两人在后（大约相距一百米）寻找我们。不料走错了路，走在前边的两个战士误走到了敌人堆里，被捉住了。走在后边的两个同志一看大事不好，拨马就往回跑。敌人一阵乱枪，把小队长特格希的马给打倒了，后边的那个战士顺势把特格希一提，提到了自己的马上，两人骑一匹马冲了出来。当天就找到了我们。被捕的两个战士，其中一个是我的哥哥哈拉巴拉，另一个叫扎尔。敌人把他俩捉住后，有的主张杀，有的主张带走。这些人中，有的认识我哥哥，就说：算了吧，他是个农民，懂个啥？是跟着他弟弟跑的。咱们有能耐，抓住协拉巴拉再枪毙。这样，把我哥哥和扎尔痛打一顿，打得皮开肉绽，昏死

过去，最后扔在草甸子上。第二天，被我们找回。

我们突围出来后，到了保康西的西艾力，在那里住下来。第二天，我们又回到了架玛吐，找到了韩德同志的尸体，庄重地安葬了他。次日，我们在色音巴雅尔同志的指挥下，缴械了图谋叛变的乌兰花中队。在这次缴械过程中，我们有十多名战士负了伤，马也损失了十多匹。经色音巴雅尔同志联系，我们把伤员送到了驻在保康的保一旅三团卫生队治疗。我和特木尔等同志住在架玛吐一带扩充了几名战士，并派特木尔同志到吐布信区求旗大队第三中队队长孟再生、指导员阿木古冷同志，解决了几匹马。

一个多月以后，即一九四六年十月，通辽失守，哲盟政府撤到了舍伯吐。有一天，色音巴雅尔同志找到我，告诉我：“经盟领导研究决定把你们四中队调到盟政府当直属警卫连，盟里已任命你为盟政府直属警卫连连长，特木尔为连指导员。你们现在的任务是护送盟政府有关人员、盟政府和部分军队干部家属以及一部分物资，撤退到北山办事处。这样，我们科左中旗旗大队第四中队就成为盟政府警卫连，从此开始了更加艰苦曲折的战斗生活。”

责任编辑 孟巴拉呼

鳳凰山事件

张汉民

在扎魯特旗西南与阿魯科尔沁旗交接处有一条南北狭长的孤岭，叫鳳凰山；山脚下有一个小村，叫鳳凰山村（现属扎旗白音他拉苏木管辖）。一九四六年冬和一九四七年春，在这个安谧的山村里曾发生过两起革命烈士殉难事件，后人把它统称为“鳳凰山事件”。

第一起事件是王世清等二同志殉难。

王世清同志是陕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革命后，在陕甘宁边区搞过土改工作。“八·一五”光复后，他受党组织派遣来到内蒙古昭乌达盟阿魯科尔沁旗白音他拉区开辟革命工作，当时任区主任之职。

一九四六年阴历十月十一日，王世清同志率领工作队来到鳳凰山村，住在富户孙凤家里（那时穷人家一无闲房，二无吃的，工作队通常都住在富人之家），打算第二天返回天山。就在当天晚上，工作队里有人暗中捣鬼，背着王世清同志，向打场的老百姓说：“现在情况很紧张，你们别打场了，都回去吧！”群众迷惑不解，都陆续回了家。大约晚十点多钟，枪声大作。待枪声停止后，魏明德等人慌里慌张地说：“刚才来了土匪，把王主任（王世清）、赵援（王主任的通信员）给打死了。现在土匪已经逃走，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不能久留……”于是他跃马扬鞭地溜之大吉。

事后才明白，制造这起血案的不是别人，正是混进土改工作队的坏分子魏明德一手策划的。魏明德早有叛变野心，他勾引土匪杀害了王世清等同志。案发后，他带领一些人投降了开鲁县的国民党。

第二起事件是斯钦朝克图等十八位同志捐躯。

一九四六年秋，国民党军发动全面内战，十月大举进犯东北。不久，通辽、奈曼、开鲁等地相继失陷。这样，阿鲁科尔沁旗也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内蒙古人民自卫军二十五团团长额尔登格与其弟阿日本嘎合谋叛变。他们乘换防之机，将该团拉到开鲁，向国民党李守信部投降。这时我党选派到该团的年轻干部斯钦朝克图同志（当时任阿日本嘎连的指导员）也被裹挟其中。斯钦朝克图同志发现额尔登格、阿日本嘎等人的叛变行为后愤慨不已，便暗中约会二十八名有志之士，于同年年底巧妙地脱离了开鲁，直奔天山，归了原队。接着，他们便配合主力部队多次投入剿匪战斗。斯钦朝克图等同志的革命壮举受到蒙汉联军司令员刘昌同志的表彰。部队首长鉴于斯钦朝克图同志有一定军事才能，破格晋升他为三十三团副团长。

一九四七年阴历正月下旬，斯钦朝克图同志奉命到敌后侦察敌情。正月二十九日晚，他率领侦察班从天山出发，第二天黎明来到了目的地——乌努格其营子（现为白音他拉苏木平安村）。经过深入群众，逐户走访，把阿日本嘎为首的叛匪人数、活动范围以及在他本套拉盖庙一带为非作歹的种种罪行了解得一清二楚，并得知查本他拉营子的巴图瓦其尔与阿日本嘎狼狈为奸的细节。第二天，侦察班转移到凤凰山